

# 生活在梦想中

Living in the dream

■文 / 朱松丽



白发的珍·古道尔博士 (Jane Goodall) 坐在书房中,回望自己的大半生,特别是在丛林中与黑猩猩为伍的那段时光,感慨地说:“I am living in my dream”(我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中)。这句话在一个半小时的记录传记影片《珍·古道尔的传奇一生》(Jane) 中出现了两次。此话不虚。

影片一开始就是珍在丛林中穿梭的镜头,穿插不多的儿时照片。旁白告诉我们珍从小就是一个热爱动物、热爱大自然的小姑娘,1960年(26岁)获得了资助,在母亲的陪伴下远赴坦桑尼亚冈贝国家公园对黑猩猩进行实地研究,从此开启了一生挚爱的黑猩猩研究和保护工作。这里不得不说这部电影有一点点遗憾,没有

把背景完全交代清楚,给人的感觉似乎就是珍简单地被那个项目的负责人路易斯·利基博士(Dr. Louis Leakey)幸运地选中,如果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一样能取得成功。实际情况是,珍中学毕业之后,从事过各种短期工作,为自己能早日到非洲进行探险做准备。早在去冈贝之前,她就自费去肯尼亚旅行,遇到在当地工作的利基博士,她的勇敢执着和对动物的热爱给利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为什么利基在寻找研究助手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并没有相关学历的珍——她是有准备的,而且是长期准备。还是那句老话,偶然性中蕴含着必然性,机会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遗憾的是,由于家庭条件所

限,珍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最初的工作成果是被质疑的,直到她发现了黑猩猩能够使用工具的铁的证据(用利基的话说,这是一项足以改变“人”的发现的发现),情况才彻底改观。1965年,珍获得了剑桥大学颁发的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从此她就名正言顺地以“古道尔博士”的称呼行走江湖了,而且在冈贝建成了一个博士培养基地,造福更多后来者。此处也为剑桥大学点个赞,英雄不问出处。

珍不仅发现了猩猩能够熟练地使用简单工具,而且观察到猩猩们组成的小社会有严格的分工和等级制度,甚至为了争夺资源,种群内部会发生残酷的“内斗”,直到将其中一部分斩尽杀绝。珍

说,当她确认了这个事实后,不得不艰难地接受了人类之间的自相残杀原来是基因决定的这一论点。哎,如果猴子们不是精明到一定程度,它们怎么能进化到“类人猿”“猿人”这个层级、以并不孔武的体格战胜其他竞争者呢?狡诈残忍是必须的。

除了对事业的追求,珍的爱情故事也让人感触良多。那真是一个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爱情故事。珍告诉我们,由于成长于单亲家庭,她对爱情从来没有期待。在她的工作成果引起注意之后,“甲方”派了一个职业摄影师过来,记录或者“监督”珍的工作。他是荷兰人雨果。珍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这是我的项目!等到雨果结束工作离开冈贝回去交差之后,珍接到了他的电报:你愿意嫁给我吗?珍没有任何犹豫:yes!哇哦,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珍的梦想中本没有爱情,而事业带给她最纯粹珍贵的爱情,现实成就了更完整的梦想。

除了对老年珍的采访,这部电影的所有镜头都由雨果拍摄。慢慢滋生的好感和爱情让镜头既写实又唯美:珍在丛林中跋涉观察,珍和猩猩们互动,珍在溪流中清洗长发……珍真是个美丽姑娘。镜头下的猩猩们就像调皮的孩子一样,偷吃香蕉、祸害他们的基地、互相梳理毛发,电影院里的我们会心地笑起来。太难得的记录。这些镜头让这部传记电影非常立体丰满。

然而,对待婚姻,珍始终是清醒的。两个人都不能放弃事业,珍的工作在冈贝,而雨果长期在塞

伦盖蒂大草原进行拍摄,尽管只有两个小时的飞机行程,他们还是聚少离多,最终选择了离婚,但依然是终身挚友。

注意到有评论对珍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同样出于她没有接受过系统科研训练这一“短板”,例如她不应该给猩猩起名字,因为这样难免带入过多情感,她以及她的研究团队不应该直接和猩猩接触,因为可能传播给它们难以抵御的疾病。确实,影片并没有避讳这一点:一段时间里猩猩们感染了“脊髓灰质炎”,死伤严重。尽管珍确认病毒不是他们团队带来的,但也痛心她表示这是研究工作遭遇到的最大挑战。从此他们再不能和猩猩直接接触。

我也想为珍说几句话,尽管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她的研究对象是“动物行为学”,田野调查自然是必须的,问题是,到了田野之后怎么办?近距离的观察以及适当融入动物种群,是不是应该算是最佳实践?远远地拿着望远镜看,不知道是否能获得同样有价值的发现?如果不能和猩猩们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甚至被它们当作“内部成员”,珍是否能有效观察到它们的“社会规则”?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与理论研究、基础研究不一样。

在现实中,科学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拓展。最近一段时间,我似乎也观察到了一种更接地气的研究或者写作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更为明显。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英格兰史六部曲》是一个例子。既然是“史”,首先需要在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方面通关,获得“历史学”的合法性认

可。从一般角度看,这样的作品必然要通过各种数据、史实的罗列来佐证作家的判断和结论,事实上彼得并没有采用这种专业史家的写作方式。例如,他没有费心去收集具体的数字指标来说明商业贸易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增长以及社会结构、心态的变化,而是用17世纪末咖啡馆里人们争相下注进行股票交易的盛况、版画广告、流行戏剧中股票交易的种种桥段,反映人们对追求财富的热情。自然这是备受争议的。彼得反驳正统史学家的偏执和枯燥,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增加本应具备的“美学旨趣”非常必要。我理解,珍作为猩猩的亲人研究它们的行为特征,就像是在正统历史学研究中注入“诗意”,不折损发现的科学性,反而增强了亲民性、普及性,并对保护动物大有裨益。

另一个例子是岳永逸教授的作品《轻得沉重:古近艺人的身份、性情和社会》,他从唐诗中深挖当时社会习俗、风尚流转、阶层等级、动荡战乱,描绘出丰富生动的唐代社会生活画卷。这不是学术研究吗?“诗和画,比历史更真实!”还有罗新教授的著作《漫长的余生》,我也理解学术性不弱。自上而下、高高在上的学术研究应该突破一些藩篱了,人文学科尤其需要。

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有珍的样子,在书房里的样子:优雅地老去,自豪地回望过去,还梳着马尾辫,一点儿也不违和。📺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